



让“友善”价值观像空气般流播

陶希东

友善，是十八大倡导的24字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对这种精神的提倡，存在社会需求与渴望。就像曾几何时，以讲究人伦道德与家庭礼仪为特色的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社会形成的“韩流”之势，反映了中国人非常认同与渴望传统礼仪和家庭美德。同理，在当今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老龄化以及人际关系功利化的背景下，重提“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生活与行为，值得每个人深

刻反思、反省与重新选择。首先要说说，当今社会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不善行为？从个体角度看，“不善”或“恶”是人类各种欲望造就的心态对我们本性的笼罩和覆盖。笔者以为，尽管当前社会存在一定数量的所谓恶人或坏人，但并不说明人性是恶的，再坏再恶的人，也是从一个至善至纯的婴儿成长而来的。这些所谓的恶人，就像是厨房当中被油烟熏染，就像是厨房当中被油烟熏染的灯泡一般，其不断变暗的原因是它被油烟牢牢笼罩，难以自拔，假若主人把油烟清洗掉，灯泡依然是亮

的这个比喻说明，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恶人，是因为他的善良之心被贪婪心、嗔恨心、愚痴心、傲慢心所笼罩，没有监督、约束和规劝，需要一种好的办法，帮助这些人去掉这层烟罩。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提出“人之初、性本善”，后天的教育，对一个人将会成为好人抑或坏人，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社会角度分析，一个人不愿意行善，不愿意当好人，社会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对好人缺乏应有的激励和保护，在现实中经常有好人既出血又流泪，使人们怀疑“好

人有好报”这一因果关系。完善制度势在必行。什么是真正、高水准的“善”？古人讲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就是说，真正善良的人，就应该像水一样。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一个善良的人，应该是一个意识和行为的高度统一体，做到念善、心善、口善、行善。笔者以为，友善就是对身边所有的人和物保持不伤害、不敌视、不歧视、不嫌弃、不欺骗等态度，平心静气、发自内心的做到

平等对待、礼貌谦让、互帮互助、友好相处，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帮助、关爱真正有需要的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群体化的人类或个体，无法离开人际友善而生存发展，只有让友善像空气和水一样充满人间，多一些包容、谦让与为别人着想，少一些对立、争斗与自我，我们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与幸福生活。友善要从身边做起、从家人做起、从小事做起，可以说友善是一次公交车上对老人的礼让，是司机对斑马线行人的一脚刹车，是在单位电梯里对同事的一个

微笑，是对受灾民众捐出的一分钱，等等，一个微小的善意乘以十三亿，一定能汇聚成爱的海洋。一方面，国家应该顶层考虑国学的创新教育问题，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孩子们心中播种、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当然也要加强对成人的教育，让人们“明心见性”、“修身齐家”；另一方面，加快完善“中国好人”的激励保护制度，促使更多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别开“新生面”？

凌河



又是年关脚下，又是闲来无事，于是又来瞧一眼文坛之上那几门“显学”，又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上回是关于“鲁研”，终于“发现”了大先生原来是个“彩民”，这一回却是关于“张学”——一个张爱玲，早已高居了云端，一门“张学”，也已经盆满钵满，按说很难再有什么“新突破”了吧！不料竟有——颇有几分“严肃性”的杂志，赫然发表重头论文，论述什么呢？原来他终于“发现”了张爱玲的“小秘密”，不是别的，竟是她的“三国”！说是1956年的11月，定居彼岸的张爱玲，因为要做一身旗袍，于是致信好友邱文美，“透露”了自己的“三国”，乃是“32.27.36.1”！因为这是英寸，生怕你看不懂，发现者还不厌其烦地换算成厘米，地道到精确至小数点之后。这样的“重大发现”，当然要万言论文，重磅标题了，因为据断定，张爱玲的这一身“窈窕”，“相信张迷们会很感兴趣”！所以论文面世虽已颇有时日，但近时的网上线下却仍在你摘我转，似乎抱到了一个金娃娃呢。不知是不是这类“严肃”的刊物，其实多年之前，也发表过“张学”的另一个“新突破”，那回不是关于“窈窕”，而是终于“发现”了张爱玲的“最爱”。“最爱”什么呢？原来是一碗“叉烧炒饭”，于是这一碗“叉烧炒饭”如何天天摆在张爱玲的餐桌之上，这份“炒饭”又是怎样的火候、如何的配方等等，似乎差一点要拿来奠定“独门”的江湖地位，只未知是否如今之“三国”那样，引起过“张迷们很感兴趣”？当然类似的“重大发现”，并不只是一门“张学”，比如周家的一张菜单，不是早已充当过“鲁研”的“新成果”吗？而那一碗红烧肉，更使得季羨林研究差点走火

也是醉了

叶开



“也是醉了”这个词在去年盛行网络之间，不断出现在商家、亲朋和各类网文中，让我深深地感到困惑：为何在信息交流如此便捷的时代，人们反而不断地感到“也是醉了”呢？对这个现象，我简直无力“吐槽”，不知怎么评价才好，想想也是醉了。一个人醉了的状态是反应迟钝、表达无力，对各种现象和各种情况，都无法作出清晰的判断。这种状态，就称为“也是醉了”。网络如此发达，人们不仅不能享受到交往和交流的便利，反而常常觉得交流不畅，甚至难以交流，这种情况的出现成为一个社会的新问题。这可能跟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一部分人核心价值的丧失有关。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老朋友聚会，三言两语之后就进入彼此不相容的争论环节。不同人等之间观点和思想的差异，并没有随着网络便利而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我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识，彼此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表达反而成为一种奢求。而且，社会上各种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不断发生，各种怪异现状让我们无力置喙，很多时候都只能沉默，禁言，潜水。二十年间，网络世界大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样态。或许，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分为“前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拥有网络之前，人类的交流方式有两种稳定状态，一种是“鸿雁传书”，第二种是电话与电报。第一种信息交流模式延续了至少两千年，后来加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火车运输，速度增加了，但没有质的飞跃。而有了电话和电报后，远距离信息传

输的实现，使人类文明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人类世界上最糟糕的形态——战争行为——也因电话、电报的发明，有了质的变化。电报距离最远，但是属于单向传输信息模式；早期电话距离相对较近，但是具有即时相向交流的特点。交流手段的飞速发展，使信息传递更加便捷，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彼此认识，进一步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物质文明的交流。世界各国的贸易模式也飞速发展。最早，人们与远方亲友交流，主要通过人力和动物力，以较为缓慢的方式寄书信和传递口信。“书”是书写下来的信件，如杜甫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因文化教育不普及不均衡，普通民众还通过请人带口信的方式与亲朋交流。正因“书”“信”这两种传递方式容易出错，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守信”无比重要。我们今天约朋友在西湖断桥相会，有手机有微信，交流很方便；谁堵车了，迟到了，发个消息或打个电话通知就行。但在古代，约好了见面，如果其中一方失约，会造成严重后果。熟悉古代传奇、戏曲类作品的读者一定知道，故事里的很多误会和悲剧，都是因为“书”与“信”在传递过程中出了问题，导致男女主人公产生误解甚至悲剧。这种误解情节如果放在今天，就不容易令人紧张和期待了。社会发展至今，拥有丰富交流手段的现代人，应该有更为多样、更为有效的讨论空间，应拥有一些相对共通的文明价值，而彼此宽容，彼此理解。但人类固有的自我封闭和顽固，却让我们失去了交流便利的有效性。这就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宽容，学会在差异间彼此尊重，让网络时代的交流更顺畅，更有效。

有多少人视上海为他乡

姜泓冰



卖鸡蛋灌饼的小摊不见了。不少在附近商务楼里上班的白领在弄堂口探头张望时，脸上都有一瞬间的诧异、失落和迷惘——近一年来，灌饼摊子每天清晨6点半开始直到中午都会准时出现，虽然因为无证照只能缩在一条窄弄堂里，但物美价廉，馅料清爽，常要排队购买，渐渐成了周围人们习惯了一种存在。摊主是来自安徽的一家三口。年轻男子是白领，早上8时30分一到，就换上职业装开着电瓶车匆匆去上班，留下老娘和媳妇继续做生意。人们夸奖灌饼好吃，口音浓重的老娘有点遗憾地说，在我们老家灌饼不是这样，这是儿子按照你们上海人口味做的。遇到男摊主闲聊，才知道婆婆二人已回乡过年了。“一年辛苦到头，得让她们多休息几天。家里事情也多。”他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在上海闯荡，七年过去，渐渐一大家人都挤在上海生活：打工的，摆摊的，收废品的，最近一个叔叔还承包了附近一处拆迁地改成的临时停车场。我说他是“新上海人”，他却一直只说“我们外地人”。在市中心的复兴西路、淮海路一带街头，人流中出没的外国面孔之常让人讶异，配合着梧桐树、老洋房的背景，有时会恍然以为身在他乡。走路或是骑车的老外们，遇上红绿灯，不少人也会抢行，有时比“攒一堆人过马路”的国人更甚，显示出对环境的无比熟悉和适应。但也只有在市中心。常住上海的外国人据说有18万人左右，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但散在这座超过2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中，就是很小的比例。核心地带的摩登景观已经像是国际一线城市的上海，已经有了五大洲的风味更顺畅，更有效。

美国国际人才密度，则离“国际范儿”还有不小距离。前几天，晚报曾有一条小消息透露，今年上海将争取设立中国绿卡受理窗口，以方便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境内长期居留的合法身份证件。不少从居留多年的国外到上海创业或工作的资深海归或是外国专家在私下聊天时，往往都会说到在中国申请科研项目、了解信息或办事的种种限制和不便，“居大不易”的烦恼，有人野心勃勃地举家而来，却终于没有“宾至如归”。也是前几天，与朋友聊起“谁是上海人”，忽然意识到，虽然有本地的身份证、户籍、朋友圈，会说上海话，对大小马路熟悉胜过许多本地人，但在工作生活20多年后，我也像鸡蛋灌饼摊主一样，被视为“新上海人”，自认为“外地人”。身边，还有出生在上海的90后，只因父母有外来基因，一样觉得自己“不是上海人”。外地人和上海人一直是很容易挑动这座城市敏感神经的一对固定词语，从当年坊间相骂演变到如今时不时来上的一段网上非理性攻讦，已是有趣的社会现象。但在努力建设“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时刻，也许真该认真思考一下：一座城市，若有近一半、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始终被认为也自认为“不是上海人”，常怀“乡愁”而常住“他乡”，到底会对于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座骄傲大城，不该有颗脆弱保守的小心脏。5年前举办世博会，曾让上海有了一次超越自我、城市空间和文化心理上脱胎换骨的美丽蜕变；而今，如果要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节点、一流城市，聚集各类创新创业人才，清除狭隘禁锢或自卑陋念，从政策到内心，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和“英雄不问出处”，已到了不能不变的时候。